

近晚凭栏

—我的文档包

刘竞生 著



情也西藏·梦也西藏
灰军装·蓝眼睛
上海旧忆
冷酷的美

民族出版社

I25
807

近晚凭栏

——我的文档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晚凭栏:我的文档包/刘竞生著. -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1.11

ISBN 7-105-04748-8

I. 近… II. 刘…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5834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260 千字

印数:0001—1000 册 定价:30.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自识(代序)

我祖籍山东平原，1935年阴历六月初三生于湖北荆州，按一般最省事的办法，在哪儿出生的就把姓加在地名前面就叫个“什么什么生”，我生在荆州，所以就叫刘荆生。后来大概觉得刘字有个立刀，荆字也有个立刀，有点重复，就把“荆”改成了“竞”，其实我看“二把刀”也挺符合我的实际，如我只读过五年小学可又一直混迹于文艺圈内，这不就是“二把刀”吗。当然改成“竞”则更有远见，它证明我这一生必须竞争才能得以生存。生肖属猪对我来说也不无影响，大半生我老是挨整或经常被人算计，猪一生不就是任人宰割的吗，或许这就是猪的属相对我的命运使然。阴历六月初三的出生日期——有时我为了填表方便可以不再加注“阴历”和“初”等字就自作主张按阳历往后机械地推了一个月，也就变成了1935年7月3日。我出生在湖北，从小就一直生活在南方，祖籍——山东看来对我似乎只有某种地理上的意义，因为籍贯这个概念本身就比较含混笼统，其实不然，我血管里流淌着的是百分之百的齐鲁大地的血，它首先从基因上给了我一个健壮的体魄和近一米八十的个头，它使我感到作为一个山东人的骄傲。我一岁

至六岁在四川奉节；七岁至十岁在贵州镇远；1949年3月参加二野五兵团第十八军文工团时是在安徽阜阳；1950年进藏又在雪域高原拉萨工作和生活了四年；1955年7月到北京报考美院，后被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到现在为止已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了近半个世纪。所以说，要问我在何时何地出生，童年在什么地方度过的，上学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生活时间最长？都可以一一作出准确无误地回答。而最后还要强调一下，我是一条山东大汉。

我一直认为自己的人生是失败的，我的家庭长期处在动荡的环境之中，而且我始终不能原谅家庭对我的成长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并给我留下了一个令我诅咒的童年，从一种失落感进而逐渐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压抑和自卑感笼罩在我整个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它促使我日后形成极为封闭和内向的性格。我还是一个没有任何机遇的人，我几乎从来没有交过什么好运，或许属猪的命本身注定就好不了。比如说：参军前，正当我刚刚开始步入接受正规教育的时候，却由于家庭的变异有两年多时间羁留于皖北的一处农村。原来我一直是在城市正规的国民小学即六年制的完小念书的，突然来到乡下农村，给人的印象似乎这里还完全处在几百年前的阶段，人们的穿着及住的房屋就像芥子园画谱上描绘的古人和茅舍。虽说这个村子里也有一间学堂，却只有一门课程和一位老师，教书先生是当地的一个地主老学究，原来正规学校的算术、自然、地理、常识、图画等课程一概都没有了，只剩下一门国文，即《古文观止》、《四书》、《左传》和唐诗等。每天学生们便在这位地主老学究带领下“子曰”、“之乎者也矣焉哉”的朗读背诵，开始一段时间我对这些连标点符号都没有的文字，根本就读不成句，更不要说读懂了，即便后来能够断句，但对于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类的内容也没任何兴趣；可随着每天这样死读硬背进

而按这位地主老学究要求的“倒背如流”及“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督导，我逐渐对这些没有标点符号的文字产生了兴趣。特别是对《古文观止》中的《兰亭集序》、《滕王阁序》、《岳阳楼记》、《醉翁亭记》等文章以及唐宋诗词更佩服得五体投地，确有“文抱风云之润，理含金石之声”之慨，所以此后我还真有点“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的感觉，对我来说这也不啻为一种歪打正着吧。我虽然最后也算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被列入不少权威的名人词典之类的词条，八一电影制片厂一级美术师，曾担任两届全军高级职称（文艺系列电影专业）评委，设计了不少影片，绘画作品参加过全国和全军美展并得过奖，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过不少文字……但我除参军前读过五年小学外，以后（可能觉得使用起来比较听话顺手）再没有进修过一天，为了要求学习甚至还受到过处分。很长一段时期我一直被扣上一顶走“白专道路”和“个人奋斗”的帽子，虽然我始终也搞不太清楚什么是“白”和“专”的终极含义，但“个人奋斗”这条路我倒的确一直是艰难地这样走过来的，为了弥补命运给我带来的缺憾，我只能靠拼命地自学，而且尽量按正规的学制所要求的那样安排自己的学习。如报考美院前，我曾经一册不拉地学完（其中不乏有许多是囫圇吞枣）整个初中和高中的全部课程包括英语。那时我在重庆的歌乐山租了一间小屋，有许多个夜晚寒窗苦读时，我硬是仿效古人用冷水浇头和用线绳把头发系在房梁上以免打瞌睡，一次为了背一段书，不顾一个臭虫正爬在我腿上叮咬，直到背完才把这臭虫捻死，可以说还真地付出了那么一点血的代价。后来我来到北京，住在前门外离天坛不远的一家小旅店，那时天坛公园要是只进大门不到祈年殿和寰丘可以不买门票，我每天一早就在大门里边找个树底下的长凳坐在那儿看书，一直到晚暮响亮起了路灯才回小旅店去。到八一制片厂后条

件好了些，我便像美院正规的课程要求那样，画那种几十个小时的石膏素描长期作业。我对西洋古典音乐有一种本能的爱好，经常买一些这方面的理论书籍看，并且在我工资只有五十来块钱的情况下仍要每月花费好几块钱买一张唱片。我还自己学会了演奏小提琴、二胡（虽然指法、弓法不太规范）和钢锯琴以及夏威夷吉他等。记得1949年初部队打过了长江进到皖南黄山脚下时，在那里与伪安徽省政府的保安旅遭遇，战斗结束后，班长拿来一只刚缴获的口琴，当时没人会吹，我拿来琢磨了一会儿，熄灯前就把它给琢磨会了。我在上厕所时，只要有可能从来没有不带上一本书或杂志的，可以说我一生中差不多有不少的书都是利用上厕所时读的。平时我的最大乐趣是泡书店和逛书市，以期能更广泛地涉猎各种新的知识领域。我原来已能说简单的日常藏语，由于离开西藏时间四十多年已忘得差不多了，但我至今仍能书写藏文，甚至当时几位藏族同事都还自叹不如。1962年我们在北戴河拍摄一部电影，住在空军的一个雷达站，由于天老下雨无法拍摄只得一直在那儿待命，别人都去逮螃蟹、游泳，可这段时间我硬是把雷达站仅有的一小书柜书全看完了，其中的毛选四卷我连正文带注释总共读了三遍，可是一到开会总结学习什么的我还是被批评为不突出政治、不爱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觉得把自己定位为“才疏学浅”和“一知半解”是比较合适的，但硬要给我扣上一个不爱学习的帽子我始终不太服气。另外我还自知自己非常迟钝和缺少机灵劲儿，尤其是即兴反应能力差，我喜欢“笨鸟先飞”这类格言；我喜欢对问题进行更深入一些地思考，乐意接受深思熟虑后的结论。虽然我绝无赞赏那种酸秀才的所谓气节的意思，但趋炎附势和随波逐流始终为我所不齿。我欣赏别人那种开朗大度与合群的性格，但我并不羡慕也不想仿效。我喜欢孤独，或者说是孤芳自赏，亦如陶渊明“引壶觞以自酌”、“倚南窗以

“骄傲”。孤独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它能够使我领悟到人生更纯粹、更深刻的东西，我常向往能像古希腊人那样使自己进入一种纯粹的思考境地。我的一个信条是对事物多观察少评论。对于“亲君子，远小人”的古训我无可置评，不过对于眼下特别是京城之内那种官场文化，交往之际往往先要了解对方老子是个什么级别的京官儿，以及那些财大气粗或自以为具有政治上、血统上的什么优越感的人，我向来是“敬而远之”。可能由于我过分挑剔和选择的痼疾，况且我厌恶那种缺乏机智和没有智慧火花的闲聊，再加上本身肚量狭小以及一种根深蒂固的恩怨情结，所以我的朋友很少。马克思说他最不能原谅的缺点仅仅是卑躬屈膝，而小民我就没有如此大度了，我对于那些伪善、献媚、诬陷、阿谀逢迎和出卖灵魂的种种卑鄙行为一概都是极难给予原谅的。我鄙视那种附庸风雅的小市民的贵族奢望，更鄙视那些道貌岸然表面上满腹经纶实则一肚子草包的大人先生们的平庸低俗。我崇拜像卢梭这样的人，他的《忏悔录》告诉我，世界上不存在什么完人，有些人自以为完美，实则是他没有勇气把自己那些卑鄙肮脏和见不得人的事抖搂出来罢了。

我在许多方面很像一个清教徒，我从不参加任何游戏，如下棋、玩牌、打麻将、打扑克以及各种球类等，虽然我知道其中一些玩法和游戏规则，但仅此而已，我绝不参与此道。因此便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如有时出外景乘火车，一个包厢里四个人，要玩扑克时总是三缺一，就我不会，很让人扫兴，所以许多人都不愿意和我坐在一起。

我对体育运动知行不一，我完全赞同生命在于运动的道理，但却始终不能付诸实践并持之以恒。即便条件再好、各种器材设备十分齐全，我也什么都不愿意参加。与此相反我喜欢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自己单独外出旅游，我酷爱到大自然中

去。1995年我花甲之年再次去了西藏，到拉萨三天后便去了藏北的那曲，在近7000多米的念青唐古拉山主峰下的羊八井热泉游了两个小时的泳，然后又到了日喀则、江孜、帕里、亚东和4300多米的乃堆拉边防哨卡以及山南地区。1997年我又只身去了海拔4000多米的中甸，在丽江玉龙雪山下的白水，别人都乘索道或骑马，我却是徒步爬到3500多米的云杉坪。1999年我又与两位年轻人徒步去到比虎跳峡更险峻的宝山古石城附近的金沙江大峡谷，并在预先情况不甚了解和未作任何安全措施保证的情况下漂流了一段；该地纳西语叫刺仁村，海拔2438米，据说这里曾是1252年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大理国时革囊渡江的地方。告别古石城后我又再次经中甸、白芒雪山和德钦的梅里雪山，进入藏东地区的盐井、芒康、左贡、邦达、昌都和四川的德格、甘孜、康定才回到内地。途中翻越的白芒、拉乌、矮拉、达马拉、夹皮拉、雀儿山以及折多山等，都在4000至5000米以上（其中雀儿山海拔6168米，山口也有5400米）。2000年我六十五岁时，只身就道翻过二郎山和折多山深入到甘孜附近的一个贫困牧区。该地在距甘孜40—50公里的罗锅梁子至色达之间的几座大山后面，需要徒步翻越五六座4000多米的大山梁，山上根本没有路，当时天上又下着雨和雪，不远处山坡上有一头硕大的野牦牛，据向导说这地方还经常有野狼出没，特别是回程时天已经快黑了，而且这天从早晨到下午整整一天我一口水一口东西都未进，我身背三个相机及附件确实有些走不动了。这时如果突然身体出点什么毛病或迷失了方向，后果会不堪设想，向导也显得有些恐慌起来，结果硬是这样坚持着走，直到六点多钟才回到停在路边的车里。今年，我六十六岁时，再次单身一人，先到原红二六军团根据地秀（山）、酉（阳）、黔（江）、彭（水）地区，并由龚滩溯乌江而上越五岭、乌蒙再经大凉山过彝族区，沿大

渡河到丹巴、大金、马尔康、红原、若尔盖过雪山、草地最后到达西宁，终于走完了全部的长征里程。经过这几次极富刺激和挑战的冒险考验，我还真有点为自己的身体感到自豪哩。

我对于精美的食物更主要地是从一种文化的角度来加以欣赏和品味，平时我喜好粗茶淡饭以及均衡营养的科学饮食习惯。我一生与吸烟无缘，但我却因被动吸烟而数次尼古丁中毒。1969年拍摄《二泉映月》到太湖边上选景，由于太湖边上比无锡城里冷，选完景大家赶快钻进一辆面包车里把窗户都关得严严的，车里一共九个人而八个是烟鬼，只有我一个人不抽烟，刚回到城里我就感到天旋地转，接着更差点虚脱，就这样一直在宾馆床上躺了两天才缓过来。其实有一段时间我曾想学抽烟来着，原因是听人说吸烟可以使思维处于兴奋状态，特别是搞创作的人，关键时候抽一支烟可以使你马上文思涌动；再则我一向比较死板僵硬，在许多场合总觉得两只手没地方放，若是这时手里拿上一支烟不就潇洒得多了吗。可是有了这次经历我只好永远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虽然有些过分自持和偏执，但也并无碍于我对一般科学常识的接受和吸纳。多年以来，我岂止是对烟，即便是茶和酒我都不沾。虽然到现在我还不能细微地分辨出茶的优劣，更不懂茶经茶道，但也不再感到茶对我是可有可无的了。

提高饮酒的水平似乎比饮茶对我更具有实际意义一些。我经常到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云南、西藏和川西一带的少数民族地区去采风搜集创作素材，而我最大的顾虑就是怕遇到喝酒的场面。许多少数民族似乎不分男女老少个个都是海量，尤其是那种热情无比的以歌劝饮的场面实在令人感动，如果劝敬到你的面前，你以不会喝酒加以拒绝，那很容易引起误会，认为你不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再就是近来各种媒体一再宣传：少量饮酒对身体、特别是对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很有好

处，所以我现在已经改正归“邪”，不再是滴酒不沾了。

我接受了上一辈家庭对孩子缺乏责任感的教训，比较注重对孩子的教育，首先是有关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以及精神卫生方面，经常给他们灌输一些传统方面的美德，如艰苦节约，不铺张浪费，要富于同情心以及如何做人等道理，可能还是由于我教子无方，子不教父之过，这方面至今仍收效甚微。在基础的综合素质培养和人文知识修养方面还算较有收效，如从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引导他们欣赏高雅音乐和经典绘画，以及培养他们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并打下较坚实的书法基础，在他们刚刚具有阅读能力和简单的判断力的时候，便让他们看《大卫·科波菲尔》、《悲惨世界》、《简爱》等世界名著和电视剧，严格限制他们接触低俗或纯娱乐性的东西。外语方面，限于我的水平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鼓励和培养他们的兴趣，现在他们分别都能掌握两三门外语，现在得轮到他们来培养我的兴趣了。

晚年生活我觉得更加充实和超然，这本书就是在没有什么外在的压力下，把多年来发表和未发表过的文字，以及一些支离破碎的札记甚至退稿加以整理完成的。眼下对我来说最主要的就是自己能够更加有效地支配宝贵的时间，也从而能够更珍视生活，更从容、更有目的和更潇洒地享受生活。



情也西藏·梦也西藏

(一)

感悟雪域、寻梦西藏，对我来说似乎是生命中的某种约定和心灵的召唤。我一直把本世纪 50 年代初随部队进军西藏这一段历程，视为我一生最值得珍贵的人生经历。从 1951 年 3 月进抵康北地区的甘孜，至 1951 年 11 月 6 日抵拉萨，到 1955 年 7 月离开西藏，我总共在雪域高原也就生活了四天左右时间，比起后来一直生活和工作在雪域高原的老西藏的同志们来，只不过是短暂的一段时间，但不同的、或许也是最难得的是我生活在西藏这段时间，整个西藏基本上还是原封不动地停留在中世纪封建农奴制度之下。当我穿过布达拉宫西侧那座古老的城门（扎格迦腻）时，便仿佛进入了一个时光隧道，整个身心立即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托起，从一种无法界定的现实和世俗向远古的宇宙飘忽而去，它使我置身于一种永恒的人类精神之中，这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绝妙体验。

大约在七百年前的元朝，西藏纳入了中国版图，此后明清朝廷以至民国中央政府都对西藏实施了有效的管辖，而与此同

时,第一批西方传教士也鬼鬼祟祟摸进了这块雪域禁地,接着打着各种名目和旗号的“朝拜者”、“探险家”和“旅游者”接踵而来,及至最后明火执仗的帝国主义分子、江洋大盗如荣赫朋之流,更踏着西藏人民的鲜血和尸骨闯入拉萨……。日后当我有机会接触到有关这方面的记述及一些历史资料时,我的这段经历便很自然地引导着我从感性上对其进行印证,从这一点说,这段不长的经历又成了我的一笔财富和难得的知识。

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无疑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一个伟大事件、一次空前壮举,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军中统帅和将领,他们执掌兵符、运筹帷幄,一声令下,十万大军便挥戈西进。面对这一伟大壮举,我当时作为一名不满十五岁的无名小卒实难对其伟大意义有多么深刻的理解和洞悉,更无法知晓和接触到高层机构的决策过程,充其量不过只能从数量上算作这壮伟行列中的一名无足轻重的小文艺兵。

我是1949年3月十八军成立后不久参加这支部队的,之后便跟着该部队狂飙般地历尽了渡江战役、浙赣追歼、衡宝战役、进军大西南及成都战役并最后驻防川南,而当时五兵团的十六军和十七军两支兄弟部队都被分配驻防在贵州。以往提起贵州,许多人都知道那里是古代的夜郎之国,随之还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两银、一雨便成冬”的顺口溜。我们路过贵州时天倒真的老是下雨,群众生活也的确相当穷困,而且还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许多人连裤子都穿不上还要抽大烟。但对所谓的“地无三尺平”(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喀斯特地形),我倒不以为然,甚至觉得贵州起伏不平的山川还挺灵秀多姿;但从总的条件来看,川南当然还是要优越得多了,比起兄弟部队来,十八军被分驻到天府之国这块富庶之地,可谓得天独厚,因而都欣喜万分。十八军自从1949年3月在河南鹿邑县吴台庙成立以来,一直是走小路钻山沟,没进过像样的城市,大多数干部和老兵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豫皖苏到大西南，始终处于动荡的战争环境之中，许多人都老大不小了还都没有成家，一直等着全国解放，生活安定下来以后解决一下个人问题，现在来到川南终于有个盼头了。当时部队曾有一个从抗日战争就延续下来的不成文的规定，叫“二八五团”。就是必须要二十八岁、五年军龄或团级干部才允许谈恋爱结婚。即便就是这几条许多人也早都够了，再加上川南不单单是天府之国的一块富庶之地，它不仅有美景、产美酒还更出美女，而且据说泸州的姑娘尤其水灵，是全川最漂亮的。这对于从冀鲁豫或豫皖苏转战而来到此地的那些傻大黑粗的北方大汉，无疑是梦寐以求的。常说“做梦娶媳妇——想的倒美！”而现在这美梦却可能即将变为现实，因此好多人心心里整天都美滋滋的。可现实生活中往往有些事情就好像是专门和人作对，你越想得美就越实现不了。这不，没过几天就接到上级的命令说，十八军已经接受了进军西藏的任务，并准备立即离开泸州开往川西的乐山待命，连已经转业到了地方上的人也不例外，通通都得回来，从哪个单位走的还回哪个单位，再把军装穿上。这下可开了锅了，首先这找老婆的事怎么办？据说有些动作快的都已经对上象了，甚至还有个别别人已经都“那个”上了。一时，一部分人的思想相当混乱，有闹情绪的，有开小差的，甚至还有自杀的……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大家，当时的思想境界也就这么高，一般认为打过了长江，全国也就算基本上解放了，现在不说革命已经进行到了底也应该算告一段落。因此原来的那“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想法自然就提到了日程上来，而这一突然变化的确使许多人不知所措，思想上更毫无准备。然而毕竟都是老同志了，即便一时思想上搞不通，组织上、行动上也还得服从。但话说回来，这不等于这些个人的实际问题就不存在，虽说藏区也有女的，但那可是风雪高原，肯定没有天府之国的姑娘这么

娇嫩水灵，退一步说即便你看上了人家，你一句藏话也不会说，怎么向人家表示呀？总不能老打手势或是你俩谈恋爱还要请一个“第三者”——通司（翻译）夹在中间吧。这突然出现的情况就像硬要把一根钢条给折弯过来，因此当时的政治部门就很形象地把解决出现的这些思想问题叫作“转弯子”。

但是当时部队普遍出现的这类思想问题对我来说却丝毫不存在，一是我当时还不到十五岁，得再熬上十来年才能到二十八岁这个年龄段，二是我几个月前才入伍，军龄也就半年多一点，就是表现得再好也至少要一年以后才能提个副排级。总之一句话：“二八五团”的条件我连边儿也沾不上，虽说有时也偶有春心萌动之念，但总还没到求偶心切的地步。再就是我也没觉得川南这地方有什么特别舍不得的，可能是顽童之心尚未脱尽，幼稚浮躁，心里老想着最好每天换一个地方，巴不得赶快出发，可谓“小卒聊发少年狂”。可我对西藏到底是个什么样，当时心中却完全是一片空白，因此，对于有关部门搜集来的一些旧杂志和旧刊物上有关西藏的照片、资料等，便整天着迷似的翻过来调过去地琢磨，并越来越向往，一天到晚脑子里老是想象着那些从未见过的雪山到底是什么样？那牦牛究竟有多大？是家畜呢还是野兽？特别是那些头戴狐皮风帽、袒露着右臂、骑着骏马、背着一支用羚羊角作支架的火枪、潇洒地游荡在雪山草地之间的英武强悍的男子，使人感到仿佛是一些古典小说里描写的欧洲中世纪的游侠和乡村骑士；健壮的藏女劳作于帐幕炊烟之间，汲水于泉边河畔，给人一种无可名状的诱惑并使我沉迷于一种幻境之中，说不清是天国里的伊甸园还是人间的桃花源。由此我便逐渐从感情上对于西藏这块未知领域产生了一种皈依感，进军西藏这一伟大壮举对我来说也就更增加了一层寻梦的性质。而作为一名年少位卑的普通小文艺兵，客观上也限制了我从主流和政治层面对这一伟大壮举进行

思考和领悟，而只能在事件的焦点以外留意着发生在身边的一些琐事，这些无足轻重的身边琐事或许没有任何史料价值，但它却是我一段最美好的情与梦的经历。

(二)

1950年3月，我们军直机关到了沫水（大渡河），与若水（青衣江）以及铜河（岷江）三水汇流之处的乐山，著名的乐山凌云大佛就静静地端坐在岸边，大佛的头顶上有乌尤、凌云二寺，由江边到山顶的凌云栈道的山壁上刻有“回头是岸”四个醒目大字。虽说此前已有先遣部队进抵西康省藏区，但整个部队的正式行动还要从军直部队在乐山召开的“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开始。和以往一样，凡大会都少不了首长讲话、群众代表发言等等，高潮时一阵阵“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西藏！”、“保卫祖国西南边疆！”、“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的口号此起彼伏，会议开得激昂热烈，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最后一项议程——“鸣炮”。可能当时还没有专门的礼炮，而要用真炮又无法解决弹着点的问题，于是有关部门决定就在会场的后面警戒出一块空地，由几名战士拿真手榴弹往里面扔。一时震耳欲聋的响声使大地都有些抖动起来。声音是响了点，但却挺有气氛，或许这更能表达我们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和保卫祖国西南边疆的决心吧。另外在会场的右后侧，有军后勤部门支起的几顶帐篷，这里陈列着为我们进藏部队配备的、适应高原生活和行军作战的武器及各种装备，如在当时比较先进的无后座力炮和卡宾枪、固体酒精燃料、代食粉及皮衣、皮鞋等。记得大家最感兴趣的是听说我们文工团每个班也将配备一支卡宾枪，还有就是呢子军装和皮袄。现在说起来有人会觉得可笑，1949年初我参军时第一次领到的一套

土布单军装，裤子还是免腰的，得老用一条布腰带轧紧才行，有些搞灯光的同志演出时在露天舞台前站在凳子上点汽灯，不小心一吸气，裤带一松裤子就会掉下来。后来我们穿的棉衣也是在中南战役时，在衡阳缴获的一处白崇禧部队被服仓库中的国民党军队的棉衣，而有些在川南新参军的同志穿的更是灰蓝色的国民党伤兵的服装，与现在陈列在这里的皮衣皮帽皮鞋，号称“三皮”的服装根本不能同日而语。特别是那皮袄更是一色宁夏出产的九道弯滩羊筒子，许多人都还是头一次见到。我们文工团的一位老炊事班长更拿起一件皮大衣感叹道：“就是过去地主老财和那黄世仁也不一定能穿上这号皮大氅啊！”

文艺部门向来是最活跃的，誓师大会后，同志们的情绪立即高涨起来，首先需要有配合当前任务的新歌曲来取代以前唱的那些老歌曲，不久音乐组的同志便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首“藏族民歌”，便带领大家一窝蜂地唱了起来，整首歌曲除了“咕呱、咕呱、咕呱咕呱咕呱”便没有其它词，当大家就这样每天“咕呱”着唱得最带劲的时候，又听说这根本不是藏族歌曲，而是云南某个更原始民族的歌曲，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热情，我们还是照旧把它当做一首藏族歌曲来唱。

这期间宣传部门正式组织了一个藏文学习班，我有幸为首批学员之一，教员即是那乐山大佛头顶后面凌云寺一位曾去过西藏的和尚，法名隆固法师。开始一段时间他穿一身内地一般出家人贯穿的那种灰布长褂，后来有一天他忽然换了一套西藏喇嘛穿的绛红色袈裟，引起大家一阵新奇。他教藏语发音带有浓重的四川口音，常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四川人说官话”，看起来四川人说藏话也真让人心有余悸呢。一个多月过去了，大多数学员仍然一句藏话也听不懂更不会说，但这个把月时间却使我对藏文产生了兴趣，可能因为是搞美术的关系，很习惯从一种图形的角度来看藏文，因此觉得藏文非常好看，特别是藏文书